

UNYIDANGSHIDANGJIAN

遵义党史党建



1

2009

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办
遵义会议纪念馆 联办

ZUNYI DANG SHI DANG JIAN

遵义党史党建



2009

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办
遵义会议纪念馆 联办

遵义党史党建

ZUN YI DANG SHI DANG JIAN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目 录

季 刊
2009年第1期
(总第26期)

2009年2月25日出版

本刊顾问: 慕德贵
 王晓光
编委会主任: 余 冷
编委会副主任: 周素平
 张明辉
编委会成员: 张黔生
 陈 松
 张 炼
 李宜淑

主 编: 张黔生
副主编: 张 炼

主办: 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
联办: 遵义会议纪念馆

卷 首 语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录…………… (1)

党史研究

论中央红军长征目的地选择始末… 陈国勇 (4)
历史岂容任意涂抹 (一) …… 曹春荣 (8)
“黔北救国义勇军”初探 …… 游平伟 (13)

党的建设 · 新农村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新里程碑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12·28”重要讲话体会…………… 林建公 (17)
一个老茶农的追求——湄潭县核桃村的变迁 (一)
……遵义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口述史课题组 (20)

党史资料

- 光荣的政治历程…… 农工党遵义市委员会 (24)
- 交通图的来历…………… 黄炜华 (27)
- 王道金在长征中 (二) …… 文博豪 (28)
- 红军孔宪权略传…………… 张治国 (30)

理论园地

- 对资本本质的再认识…………… 梅宁华 (31)

党史文化 · 地方文化 · 红色旅游

- 中国,一路走来(组诗)…………… 卜宗学 (36)
- 乡村拾忆(一)…………… 任明勇 (38)
- 长征奇闻之稀世照相…………… 孟 红 (40)

信息窗

- 全市党史系统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研讨会在余庆县召开…………… 广 一 (41)
- 《中国共产党习水县历史》第一卷送审本获原则通过…………… 广 一 (41)
- 遵义党政大事记(2008 年 10 月—12 月)
…………… 李宜淑摘编 (42)

封面照片:遵义市党史系统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理论研讨会。

(摄影:杨世维)

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本刊有权对来稿进行修改,如不愿修改请予注明。欢迎观点正确、鲜明,紧密联系实际,论证充分,逻辑性强,精干活泼的论文;欢迎客观真实,语言精炼,数据准确的史料性文章,以及思想和艺术性高的文艺作品和相关图片。

来稿须注明作者实名(发表署名可用笔名),单位全称、职务、性别、学历、职称、联系地址、邮编、电话等。

来稿须符合文稿规范,一律打印,并附寄电子邮件至本刊邮箱(见 E-mail 地址)。

本刊作者稿件(内容、注释等)文责自负,如有侵权行为或不准之处,本刊不负任何连带责任。

编辑部:遵义市委党史
研究室征研科

编辑:李宜淑 邬雨淞
杨世维 费侃如
关黔新 刘 畅

电话:(0852) 8650225

E-mail: zydsyj@126.com

邮编:563000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南京路 28 号

印刷单位:遵义市嘉联包装
有限责任公司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摘自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

ZUNYI DANG SHI DANG JIAN

遵义党史党建



2009

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办
遵义会议纪念馆 联办

季 刊

2009年第1期

(总第26期)

2009年2月25日出版

本刊顾问: 慕德贵

王晓光

编委会主任: 余 冷

编委会副主任: 周素平

张明辉

编委会成员: 张黔生

陈 松

张 炼

李宜淑

主 编: 张黔生

副主编: 张 炼

主办: 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

联办: 遵义会议纪念馆

遵义党史党建

ZUN YI DANG SHI DANG JIAN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目 录

卷首语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录…………… (1)

党史研究

论中央红军长征目的地选择始末… 陈国勇 (4)
历史岂容任意涂抹 (一) …… 曹春荣 (8)
“黔北救国义勇军”初探 …… 游平伟 (13)

党的建设 · 新农村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新里程碑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12·28”重要讲话体会…………… 林建公 (17)
一个老茶农的追求——湄潭县核桃村的变迁 (一)
……遵义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口述史课题组 (20)

党史资料

- 光荣的政治历程…… 农工党遵义市委员会 (24)
- 交通图的来历…………… 黄炜华 (27)
- 王道金在长征中 (二) …… 文博豪 (28)
- 红军孔宪权略传…………… 张治国 (30)

理论园地

- 对资本本质的再认识…………… 梅宁华 (31)

党史文化 · 地方文化 · 红色旅游

- 中国,一路走来(组诗)…………… 卜宗学 (36)
- 乡村拾忆(一)…………… 任明勇 (38)
- 长征奇闻之稀世照相…………… 孟 红 (40)

信息窗

- 全市党史系统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研讨会在余庆县召开…………… 广 一 (41)
- 《中国共产党习水县历史》第一卷送审本获原则通过…………… 广 一 (41)
- 遵义党政大事记(2008 年 10 月—12 月)
…………… 李宜淑摘编 (42)

封面照片:遵义市党史系统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理论研讨会。

(摄影:杨世维)

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本刊有权对来稿进行修改,如不愿修改请予注明。欢迎观点正确、鲜明,紧密联系实际,论证充分,逻辑性强,精干活泼的论文;欢迎客观真实,语言精炼,数据准确的史料性文章,以及思想和艺术性高的文艺作品和相关图片。

来稿须注明作者实名(发表署名可用笔名),单位全称、职务、性别、学历、职称、联系地址、邮编、电话等。

来稿须符合文稿规范,一律打印,并附寄电子邮件至本刊邮箱(见 E-mail 地址)。

本刊作者稿件(内容、注释等)文责自负,如有侵权行为或不准之处,本刊不负任何连带责任。

编辑部:遵义市委党史
研究室征研科

编辑:李宜淑 邬雨淞
杨世维 费侃如
关黔新 刘 畅

电话:(0852) 8650225

E-mail: zydsyj@126.com

邮编:563000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南京路 28 号

印刷单位:遵义市嘉联包装
有限责任公司

论中央红军长征目的地选择始末

陈国勇

一、中央红军为何要进行长征

1927年10月，毛泽东、朱德等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并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打土豪分田地，使丧失土地的广大农民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解决了农民视为“命根子”的土地问题，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仅三年时间，就建立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越烧越旺。而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怎能容得革命的火种扩展。从1930年10月至1932年底，蒋介石先后调集10万、20万、40万兵力、30多个师对红军各革命根据地分别进行第一、二、三、四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正确领导下，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取得了一至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共歼灭敌人约10万人。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的准备，调集约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就以5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进攻，此时的红军还有30多万人，其中中央红军还有10多万人。但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下，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等被动消极防御战术，使红军被动地遭受了巨大损失。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不得不考虑红军进行大转移的问题。1934年9月底，蒋介石为了彻底消灭红军，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用150万大军合围瑞金的“铁桶计划”，参加这一军事会议倾向红军的国民党将领莫雄通过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于10月7日将这一重要情报送达周恩来之手，为此，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中旬被迫提前半个月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性转移，即长征。

二、中央红军长征中先后七次选择的目

的地

由于受“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指挥和影响，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战略性的大转移。在这一战略性转移过程中，对转移的目的地即中央红军要到何处落脚，重新开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问题，从长征过程中的时间和史实来考证分析，经历了以下这样一些过程。

（一）中央红军要转移到湘西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还是到川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刚转移时，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博古和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计划是要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军二、六军团会合后再作下一步打算，所以中央红军沿着赣、粤、湘、桂边境一直向西行动，蒋介石发现判断中央红军要到湘西同红军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后，调集了粤军、湘军、桂军16个师的77个团，重兵设置了四道封锁线阻击红军，使中央红军一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了3万多人。中央红军如果继续向湘西行进，就会进入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战，中央红军就会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是继续执行“左”倾军事冒险者向湘西行进的决心，还是机动灵活地调整军事行动计划。在这一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边，到敌人力量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妥当的方针。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方针。但博古、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仍坚持要到湘西去。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军占

领的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会上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等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改变了过去军事工作由博古、李德全权负责包办的状况。之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部队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中央红军于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二）“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后决定要建立的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央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的长征中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不仅纠正了过去党内的“左”倾军事路线，而且从组织上改变了党的领导，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军事行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在“遵义会议”上还根据当时的形势，讨论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大家认为贵州山多人稀少，少数民族居多，党在这里的工作基础较薄弱，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困难很大，决定放弃以黔北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想法。会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中央红军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宽阔的地域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他们的建议得到朱德总司令等人的赞同。四川的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因为四川人口稠密，经济上比黔北好，很有发展余地，还有红四方面军的接应。会议绝大多数人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三）争取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随后，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向长江进军时，从情报中得知川军刘湘的36个团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严密封锁了长江，在川南各县的要隘，赶筑了碉堡和工事，还纠集团及地方武装，配备大量手榴弹，倾其全力阻拦红

军北渡。中央红军如按原计划北渡长江创建革命根据地已不可能，根据敌情的变化，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立即改向川滇边境云南昭通地区的扎西集中，然后在川滇边境进行机动作战，争取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为此，1935年2月，中央红军过云南时，留下了革命的火种。在“扎西会议”上作出了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的决定，在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广大地区开展革命游击战争。中革军委和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从中央红军中抽调100多名干部留下与当地的叙永特区游击队合编，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下辖有云南支队，建立发展红军革命根据地，在川滇黔三省开展游击战争至1938年。

（四）曾计划建立川西苏区革命根据地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中革军委指挥下，开展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调动重兵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

4月29日，中革军委在昆明寻甸的鲁口哨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并指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为了迷惑敌人，中央红军在昆明城附近虚晃一枪后，便分兵三路直插金沙江。

5月1日至9日，三万多中央红军凭着6条木船，在当地37名各族船工的帮助下，经9天9夜的奋力摆渡，全部顺利地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天险，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实现渡江北上准备建立川西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转移。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人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强渡嘉

陵江战役,并取得胜利后,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把原定留守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张国焘采取这一错误行动,是由于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他看不到坚持这个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因此,中央红军后来没有实现在川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五) 要创建川陕甘苏区革命根据地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见到在此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接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等都出席了大会。

两大红军主力的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会师大会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这时,两个方面军都已离开原有的革命根据地,关键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报告中提出新的革命根据地需要具备的三个条件:一是地域宽大,好机动;二是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三是经济条件较好。结论是应该去川陕甘。会上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通过这个战略方针。28日,中央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

(六) 到中苏边界创建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共同北上的方针遭到张国焘的破坏,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俄界会议,点名批评了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反党错误,还着重讨论了北上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俄界会议报告中指出:“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补充决定》上说的向黄河以东。但这个方针应该有些不同,目前应该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建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中央要

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张闻天在发言中也指出:“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红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力量是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改变,在陕甘创建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地进行国内战争。”所以说,中央当时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靠近苏联边境建立发展革命根据地,并求得国际援助的策略。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何凯丰、刘少奇、邓发。列席会议的有红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还有李维汉、叶剑英、蔡树藩、杨尚昆、林伯渠、李德等。周恩来因病未能到会。与会同志进行了认真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中央采取的措施和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会议还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北上的中央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于形势紧迫,9月13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9月17日,先锋部队攀登悬崖陡壁,袭击国民党守军侧背,一举突破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的开阔地带,随即占领哈达铺。

(七) 最终决定到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建立指挥全国革命的根据地

红军到达哈达铺,下一步去哪里?在此期间,红军的侦察连从当地的邮电所里获得了许多报纸。毛泽东等领导人如获至宝,立即分头阅读,这些报纸中最有价值的是天津的《大公报》,经常刊登一些比较客观的消息。张闻天边看边做摘录,他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动态都抄下来,还写了读报笔记。他们特别关心各地红军活动的消息。在1935年7月、8月的《大公报》上,反映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和陕北红军的消息有十几条,其中又以陕北红军的消息较多。毛泽东看到8月1日的《大公报》上的一条消息:“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老多。……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大公报》上还刊载“全陕北有三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毛泽东看到这些消息,真是天大的喜讯。在两河口会议的时候,中央就作出了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策。但是究竟在什

么地方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因为中央只知道西北地区有红军的武装在活动，但具体情况如何，有多少人，具体是在哪里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则缺乏准确的情报。毛泽东正在为下一步把红军带向何处而费心思，现在突然获悉陕北的刘志丹还有一支红军队伍和一大块革命根据地，这个消息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毛泽东急切地想要了解陕北的情况，立刻叫人把贾拓夫找来。贾拓夫原来在陕西从事革命工作，1932年奉命到江西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汇报工作，后来就留在了中央苏区，后来随中央红军长征。贾拓夫对刘志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略知。随后的几天，毛泽东一直让贾拓夫与他同行，边走边聊。从那时起，一个会合刘志丹，在陕北扩大革命根据地，建立苏区的计划在毛泽东头脑中酝酿并形成。

9月22日，中央红军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挺进陕北的行动方针。哈达铺会议是贯彻俄界会议到陕北去的精神，但并不就此确定红军长征落脚点就放在陕北，因为党中央在哈达铺并没有研究过红军具体落脚点的问题。

27日，党中央领导随陕甘支队到达甘肃南部通渭县南的榜罗镇，在一所小学校里又获得了一些报纸，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人第一次从报纸上得知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以及其后日益恶化的华北形势，同时也得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的具体情况。当晚，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战略方针。分析了报纸上刊载的情况后，党中央决定改变原来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正式决定迅速前往陕北苏区，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并正式宣布以陕北革命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28日早晨，红军在榜罗镇一个空旷的打麦场地上，召开了陕甘支队一千多名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指出了日本侵略我国北方的严重性，阐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伟大意义。接着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提出要迅速到陕北革命苏区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林彪也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阐述了北上抗日的意义，要求各部队作好进入陕北革命苏区

的准备。因此，榜罗镇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是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议的继续和深入，是为实现党中央关于到陕北去的战略方针的最后动员和重大决定。随后，党中央和红军迅速北上，于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陕甘支队6000余人，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红十五军团是由先期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同原陕北苏区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于1935年9月合编而成，共7000余人）胜利会师。至此，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历经一年，跨越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伟大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是处于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的严重情况下，被迫进行战略性大转移的。长征是后来才有的名词。中央红军开始踏上战略大转移的征途时，并未知道，也并未决定最终要到陕北苏区扩展建立革命的大本营，而是大体经历了本文所述的以上七个阶段和过程。这个变化过程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随着长征途中所遇到的各种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不同计划和选择。长征落脚点的最终选定，关系到红军战略大转移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所以党中央对长征落脚点的选择，是在长征途中，经过慎之又慎，反复思考，充分酝酿讨论，认真分析各种复杂情况后，审慎决择，最后才决定到陕北革命根据地扩展革命苏区，作为革命的大本营来继续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全面开展。

参考文献资料：

- 1、《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 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
- 3、《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刘统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二版）
- 4、《论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何新宇著，《银川党史》2005年第3期）
- 5、《万里长征亲历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1996年9月第一版）
- 6、《红军长征过云南》（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

作者单位：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校对：李宜淑）

历史岂容任意涂抹（一）

——驳《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曹春荣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写了一篇约18000字的《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发表在文学双月刊《钟山》2008年第3期上。2008年7月1日的《作家文摘》旋即以相似标题予以转载。这篇从标题到内容都不同于一般传记文学的长文，倒像一篇论述中共党史上某桩公案的学术论文。然而，它又不遵循通常的学术规范，断章取义、张冠李戴齐有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者有之，罔顾史实、信口雌黄者亦有之；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对这样一篇让人瞠目结舌、容易误信的奇文，笔者乐为“疑义相与释”，谈谈个人对王文论证的瞿秋白三个“不得不”的看法。

—

1934年1月上旬，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首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有其“不得不走”的原因，但绝对不是王明团伙（或博古中央）“为了更好地对瞿秋白进行监管”，更不是他们“要了莫斯科时期未了之愿”，“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引文均见王文，以下凡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早在王文之前，丁玲就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的回忆文章中说：“1934年初，他（按指秋白）就不得不撤出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去了”。^①瞿秋白为什么“不得不撤出上海”而转移苏区，丁玲没作解释，但文中提到秋白因“匿住”而感“孤寂”。萧三在《忆秋白》一文中说得明白：“在搞地下工作的时期，秋白同志多次在

鲁迅先生家避难。”^②鲁迅夫人许广平在《瞿秋白与鲁迅》一文中，详细叙述了“秋白同志在鲁迅寓内度过三次避难生活”的情景。^③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在《忆秋白》的长篇回忆录中，将秋白在上海所处的生存环境、工作环境，用几个短句就展现得清清楚楚：“秋白就在这短短几年中（按指1930年8月至1934年1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威胁下，在地下的流浪生活中，把自己的心血放进新文学中去。”^④那种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不仅秋白夫妇深深感受到，就连他们的同志、友人也一样感受到。郑振铎在《回忆早年的瞿秋白》一文中就写道：“有几次在街头遇到了，他戴着鸭舌帽，帽檐低压着眉梢，坐着洋车，疾驰而过，我们只是彼此望了一下，连招呼也不打。”^⑤

仅从以上几个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便不难看到，瞿秋白其时在上海的处境，哪里能跟王文所言“周扬、夏衍等人就一直在上海隐蔽下来并且平安无事”相类比呢？此中道理其实很简单：周、夏何许人也？秋白又何许人也？他们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眼中的份量、危害，能一样吗？

事实上，瞿秋白在上海的那几年，正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加重对中央白区地下组织的破坏，日甚一日之时。期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等机关迭遭破坏，许多党、团、工会和其他群团的领导人及工作人员被捕、被关、被杀。1931年9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出通缉令，悬赏两万元缉拿瞿秋白、周恩来，悬赏一万元缉拿王明、罗登贤、沈泽民、洛甫、博古。这使得瞿秋白在上海的处境极其险恶。中共临时中央既然在上海无法立足，而于1933年1月从上海迁至瑞金

那么,其后调瞿秋白去瑞金,就可以视为对瞿秋白的一种保护,而不是相反。这也正是本文所说的,秋白离开上海到瑞金,有其“不得不走”的一个客观原因,或环境因素。

瞿秋白奉调瑞金的经过,完全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在这一点上,瞿秋白无所谓“不得不走”的问题。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考证,1933年12月末,时任中共中央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书记、中央分管政府工作的张闻天,同党校校长冯雪峰(按:冯因准备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而比瞿秋白早一个来月从上海到了瑞金)商定并得到博古同意请瞿秋白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长,最后由冯雪峰发电报至上海通知瞿秋白,瞿秋白接电报后于1934年1月7日离开上海,2月5日抵瑞到任。”⁽⁷⁾

这里有必要把当时的相关背景作个介绍。早在1931年11月,瞿秋白就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部长)。因为他远在上海,不能到职视事,遂由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代理部长。1934年1月22日在瑞金开幕的第二次全苏大会,又在瞿秋白未及与会的情况下,继续选举(任命)他担任了上述两个职务。张闻天根据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他对秋白本人的透彻了解,加上详细听取了刚从上海来到瑞金不久,而与瞿秋白和鲁迅都有密切联系且相互了解的冯雪峰的情况介绍,并与之商定后,会提出让瞿秋白脱离虎口、到瑞金就职的主张,乃是合情合理、不足为怪的事。

杨之华的回忆也提到1933年冬的一天晚上,“有一位同志来到我家,对秋白说:‘中央有电报来要你去中央苏区。’”⁽⁸⁾

《瞿秋白年谱新编》根据袁孟超的《1933年中其江苏省委的一些情况》,以及杨之华的上述回忆,也在“1933年12月”条写道“一个傍晚,冯雪峰和袁孟超(即袁家镛)来到上海黄陂路鸣琴坊内某号三楼瞿秋白寓所,传达中央调瞿秋白去中央苏区的电报通知。”⁽⁹⁾

上引中共党史权威研究机构及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应当是可靠且可信的(虽然瞿谱说到冯、袁二人去通知瞿,但这明显是袁的误记,实在应是袁接冯的电报后去通知瞿。当然,这不会影响到事情的本质)。这就毋庸置疑地说明:博古中央调瞿秋白去苏区,完全是出以公心,而非挟嫌报复,欲置秋白予死地。

当时,瞿秋白听到中央调动的电报通知后的第一反应,以及他在瑞金途中写给妻子的信,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瞿秋白是欣然前往苏区,而不是什么戚戚然“不得不走”。

作为瞿秋白深爱的妻子和革命伴侣,当年现场的目击者,杨之华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们:瞿秋白听了中央电报的传达后,“毫不迟疑地回答:‘想去很久了。’”⁽¹⁰⁾带着这种渴望的心情,瞿秋白在将要动身去苏区的前几天,除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整理其文学译著外,还特意抽出时间与曾在艰苦环境中并肩作战的友人——鲁迅和茅盾话别,并因此行顺利而满意;安排自己走后妻子的学习,跟妻子一同倾诉革命情怀,表达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秋白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内心是愉快的,精神是很好的,当然,也不免有译著未完的惋惜,为别后妻子生活、安全的耽心。两相比较,还是迎接新环境、新战斗的欣喜更多。翌年初,瞿秋白告别妻子,踏上去苏区的路程。过了半个月,杨之华收到秋白托人带给她的一张小条子,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到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¹¹⁾这里的“老家”、“天堂”,显然都是指秋白即将到达的中央苏区。

瞿秋白对苏区的关切、向往之情,并非偶然发生的。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个致力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进步的革命者,瞿秋白很早就意识到:要在中国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走毛泽东们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他支持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书的出版发行,并为之作序;在《共产国际》第1期上发表《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欢呼“毛泽东红军万岁”!他临危受命,主持党的八七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进一步部署了湘鄂粤赣的秋收起义。此后,他把上

述政治理念的实现寄托在苏区,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创建的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上。对于置身国民党反动当局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悬赏通缉的威胁之下的瞿秋白来说,身患严重的肺结核,却不得不东躲西藏、疲于奔命,连晒晒太阳也成了奢望。转而向往党领导下的、可以自由呼吸新鲜空气、尽情沐浴和煦阳光;可以广泛接近农民、了解农民,以弥补自己的知识分子缺陷;可以放手实施自己的文艺大众化主张、推进苏维埃文艺运动;甚而可以做更多的理论、宣传、教育、文化工作,以尽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的中央苏区,这实在是情理中事,太自然了。

事实上,瞿秋白进入中央苏区以后,不仅担负起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府教育部长的重任,而且兼任了艺术局负责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校长,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共苏区中央局、全总苏区执行局、少共苏区中央局联合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笔。他不单在中央苏区的教育、艺术、新闻出版、群众文化等方面有大量卓有成效的建树(用时任教育部秘书的庄东晓的话来说,瞿秋白为苏维埃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一个崭新的宏伟的蓝图;而且还经常应邀到红军大学讲授《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政治理论课程,在《红色中华》及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长短不一、内容广泛的时评和政论(这一点,足以证实王文所言“瞿秋白赴赣后,就果然再也没有写过政论性文章”的不实)。在中央苏区短短一年里,瞿秋白的革命热情始终处于高涨状态。他奋不顾身努力工作,广泛接触、联系苏区干群,吸收新鲜知识和经验,学会了骑马不怕走路爬山,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与赞扬。诚如徐特立生前对杨之华所说,秋白“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里,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十分愉快”。“真的,有不少同志告诉我,秋白在苏区是很愉快的”。“同志们见了(秋白骑一匹黑马奔驰)都很欢喜,说:‘秋白同志年轻了,完全变了一个人,多么活跃!’”是啊!“生活在自己的政权下,踏着自己的土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心情怎能不变呢”?⁽¹²⁾

然而,王教授可不愿意看到这一切,他一门

心思认定:瞿秋白离开上海去苏区,就是“不得不走”,就是受到博古中央、博古们挟嫌报复和无尽迫害的结果。为此,他上挂下联、无限上纲、任意曲解、乃至无端妄断地搜罗一大堆“根据”,希图使人相信他的论断。

首先,王教授把事情的由来追溯到八十来年前,共产国际(及联共)同中国共产党发生某些分歧与斗争的背景下,王明、博古们为争夺中共领导权而视瞿秋白为头号敌人,必欲扳倒。对于这么一桩中共党史上的公案,见仁见智,不足为奇。但须实事求是,秉公而论。毋庸讳言,王明、博古等在错误批判瞿秋白、致使他离开中共领导岗位这件事上,的确起了不好或很坏的作用。然而,在共产国际执意要撤换不能忠实于国际路线、贯彻国际意图,却同情以至支持敢于和国际叫板且不听警告的李立三的“调和路线头子”瞿秋白的既定方针下,即使没有王明、博古使坏,瞿秋白也难免被撤职。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理清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共产国际(包括其不同层次的代表人物如米夫)与王明、博古等人之间的主从关系。质言之,不能简单地把王明、博古等与瞿秋白的斗争,看作个人恩怨,博古也没有必要对“早已被闲置抛弃”的瞿秋白穷追猛打、置于死地(对此,我们不妨全面考察一下博古短暂的三十九岁的辉煌与悲壮的人生。)

其次,王教授把事情的近因挂在1933年秋的“《斗争》事件”上,断言“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批瞿的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又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桩公案。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直至王文发表,这桩公案都被弄成了糊涂案、甚而冤案。

所谓“《斗争》事件”(这是笔者借用陈铁健先生大著《从书生到领袖 瞿秋白》里的说法),指的是1933年夏秋之际,瞿秋白在中共江苏省委编的刊物《斗争》(油印本)上,用“狄康”或“康”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棉麦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有组织的饥饿政策”》、《国民党的“仁爱”》等约20篇是评杂文。同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上海局(又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简称中央上海局或上海中央局)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决定》。该决定“认

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他立刻解除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武装，在全党面前公开的诚恳的揭露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实质”。并且认为各级党部应对狄康同志的错误”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对于接连发表狄康文章的《斗争》编者，也提出了批评，成立编辑委员会、实行重要文章集体审查的决定。⁽¹³⁾10月底，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署名文章，批判瞿秋白。这便是“斗争事件”的大致经过。

行文至此，不妨介绍一下上文所涉背景。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后，成立了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它的第一任书记，就是扬言要把瞿秋白“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的李竹声。中央上海局的主要任务是：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党在白区的工作，负责同全国各地党组织、共产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与苏区党中央的联系工作，并直接领导江苏省委。其时江苏省委的辖区包括江苏和上海，机关设在上海。中央上海局成立后，曾用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系列宣言、决议、决定、指示、通知。“据考证，1933年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文件中，绝大部分是中央上海局发出的”。⁽¹⁴⁾

王教授（及其他论者）在论述“《斗争》事件”时，明显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江苏省委编的《斗争》，误认为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机关报的《斗争》。其实，后者是中共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于1933年2月4日在瑞金创刊的。它是将苏区中央局于头年2月和6月先后创办的《实话》、《党的建设》合并为一种，并改名而来的。王教授不明就里，想当然说：“1933年春夏，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用狄康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最大借款的目的》（按这个标题弄错了）、《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近20篇政论时评。”于是，批判瞿秋白，对他的“政治残年”作“最后一击”这桩恶行，便与“博古中央”挂钩了。王的第二个错误，是把批瞿的“9·22”决定的炮制者、发布者，误判为“博古中央”，却不知道这事乃上海中央局所为，本不干“博古中央”事，更非干博古事。如果一定要

说与两者有关系，也只能是从组织方面说，即所谓“领导责任”。但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或因形势变化，或因接到共产国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件、指示，上海中央局用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宣言、决议、决定、指示、通知，不必经过博古同意签发。况且“9·22”决定针对的是上海中央局管内发生的问题，更加不必非得博古同意签发才行。这样，对瞿秋白的“政治残年”作“最后一击”的指责，就无由坐实为“博古中央”和博古了。

事实上，除了《斗争》第33、34期连载了《红旗周报》上署名“海浪”的文章外，当时在中央苏区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如批判罗明路线一般地开展批判瞿秋白的机会主义。这并不奇怪，一来中央苏区的批判罗明路线运动刚刚收兵，再来一场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既无必要，也难以动员组织，何况马上就要着手进行第五次反“围剿”；二来瞿秋白的问题发生在白区，对苏区没有形成什么影响。因而与此事相关的博古、张闻天，都没有发表讲话或写文章批判瞿秋白（这跟批判罗明路线有极大的不同）。倒是在事发不久就安排瞿秋白撤离上海进苏区，并且委以各种要职，放手让他工作。如此看来，把瞿秋白离沪赴赣一事，归结为博古中央和博古个人对他的“人身迫害”、“想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便毫无根据、毫无道理。

王教授进一步深入分析“博古中央”、“博古们”、“非要把瞿秋白弄到瑞金不可”的原因：一是便于监管，不让他“乱说乱动”，继续发挥其影响；二是不让他能在上海安心养病，而使他在条件不利于其健康的“苏区”“身体一天天恶化”，直至“肉体消灭”；三是不愿看到“离开政治舞台后的瞿秋白似乎生活得比以前更好”的“嫉妒”心理使然。听了王教授这些惊人之语，不免教人想到中国的一句老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综观其文所述，王教授的这些分析原本无须再驳，其不顾史实、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但凡对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会嗤之以鼻。但对王文提到的几个具体问题，还是有必要作辨析。

其一，所谓瞿秋白到瑞金后“身心两方面，都处于受煎熬的状态”。王文断章取义地摘录了

本文前引徐特立回忆的另一段文字,即苏区缺粮缺盐的情况,以此说明瞿秋白在苏区身体如何受煎熬。又转录了《陆定一传》的一段文字,即陆定一在瑞金为避嫌,想见见熟悉的瞿秋白都始终没去,以此说明瞿秋白在苏区心灵如何受煎熬。令人费解的是,王教授为何对徐特立回忆中足以说明瞿秋白在瑞金精神生活很愉快,以及叙述秋白领导的教育部在节省运动中“节约得过火”的大段文字视而不见、不感兴趣?为什么无视在苏区、在瑞金,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博古和张闻天、王稼祥、顾作霖、凯丰等“博古们”在内的党的高级干部,无一例外地过着缺粮缺盐的艰苦生活,却依然热情洋溢地工作、战斗的事实,而单挑瞿秋白说事?

诚然,瞿秋白身患严重的肺病,能有条件改善生活,完全应当。他身边的同志们也确实尽可能照顾了他,不时送给他一点盐和其他食品。教育部秘书庄东晓,受秋白的老战友们的嘱托,更是尽心照料他,往往跑几里路去圩场买条鱼或几只蛋,以增加秋白营养。秋白却“总是问东西是哪里来的,旁人有没有得吃,推来让去”。“人家都关心着秋白同志的健康,为他担心,可是他却经常忘了自己”。“他三日两头发高烧,傅连璋医生(时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天天都走来给他看病、开药、打针”。而他“躺在床上还是要看文件,处理日常事务”。⁽¹⁵⁾瞿秋白这种自觉投身苏区艰苦却火热的斗争生活的种种表现,怎么就被王教授独具只眼地视为“身心两方面,都处于受煎熬的状态”呢?至于“陆定一的感受,无论如何都只是他的个人体验,既不能概括当年瑞金革命大家庭的基本氛围,也不能说明瞿秋白在瑞金的全部际遇。

其二,所谓博古们“强令瞿秋白到‘苏区’却又坚拒杨之华同行的请求”。关于“强令”的问题,本文已为之辨析并否定。关于“坚拒”一事,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当事人的记述吧。杨之华在写于半个世纪前的《忆秋白》一文中说道,秋白听了中央电报的传达后毫不迟疑地回答:“想去很久了。”“他沉静地点燃了手上的烟斗,问:‘之华可以同去吗?’”负责传达电报的同志无法回答,允以把秋白的意见反映给组织。“第二天,那位同志又来了”,答复道:“之华去苏区的问题,

要等有人代替她的工作才能走;请你(秋白)先走吧!”⁽¹⁶⁾

杨之华的这段记述清楚表明:“博古们”没有“坚拒”瞿秋白与杨之华同行去苏区的心意表白,而是有条件地表示理解和允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博古们”这样的答复并没有什么出格之处,类似的情形也绝非只有瞿秋白夫妇会遇到。事实上,当时杨之华担任着组织部的秘书工作(按:这里的“组织部”求属上海中央局还是江苏省委,抑或别的党委,当事人未予说明),而且就在瞿秋白临走的前一天,杨之华还参加了一整天的会议。这说明,其时杨之华的确在从事繁忙的革命工作,她要离去,也的确要有人接替。至于后来为什么杨之华终于未能在瑞金与丈夫重逢,笔者尚未掌握相关史料,不便妄言。然则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得出王教授的如此惊世之论:“在莫斯科时期,王明团伙就想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不妨说,此番令瞿秋白只身赴‘苏区’,仍是要了莫斯科时期未了之愿,仍是要竟莫斯科时期未竟之业。”

(未完待续)

注: (1) (2) (3) (4) (5) (8) (10) (11) (12) (15) (16) 丁景唐等编:《瞿秋白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35、30、173—180、91、18、92、92、95、98、217、92、99、211、137、282—283页。

(6) 见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2月版,第400—401页。

(7)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212页。

(9) 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68,392—393页。

(13) 参见《六大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56页。

(14)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196—197页。

作者系:江西瑞金党史办原副主任

(校对:李宜淑)

“黔北救国义勇军”初探

游平伟

1935年9月在正安县庙塘成立的以詹纪高、罗彬、唐克明为主要领导人的“黔北救国义勇军”，由于年代久远，缺乏义勇军主要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述，兼之对义勇军的性质难以确认，因此，涉及义勇军的文章很少面世，以致人们对此知之甚少。笔者根据现有史料，撰成本文，抛砖引玉加强对这一史事的研究，以期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一、“黔北救国义勇军”的组建

1、“黔北救国义勇军”组建的背景

在义勇军组建之前，1935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为牵制敌军，打击地方反动势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中革军委曾在黔北决定组建了三支红军游击队，即红军黔北游击队、红军遵（义）湄（潭）绥（阳）游击队和红军赤水河游击队。其中，红军赤水河游击队，1935年3月中旬成立于鸭溪、长干山一带，罗彬（又名罗明山，广西人，中央纵队二梯队原司令员兼政委）任队长，胡方（红军干部）任副队长，吴××（红军干部）任政委，余德胜（红军干部）任特派员。全队100多人分3个中队。有党员30多人，建立一个党支部，下辖3个党小组。有手枪、冲锋枪、步枪80多支。主要活动于遵义、仁怀、桐梓、习水等县边境地区。同年4月中旬，在仁怀县周家场（今属习水县）反击马桑区民团伏击的战斗中，政委吴XX不幸牺牲。不久，队长罗彬因患重病，寄养于桑木一群众家中。由于领导力量薄弱，赤水河游击队由副队长胡方带领，于4月下旬前往放牛坪，与红军黔北游击队合队。合队后的黔北游击队后来发展到400多人，于6月底离开放牛坪游击区。于7月初在川南叙永县朱家山与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胜利

会师后，两支游击队合编组建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主要活动于川滇黔三省边境，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①。

放牛坪一带系仁怀、习水、桐梓三县结合部，地处边远偏僻，周边地方绿林武装常在此出没，活动频繁。合队后的黔北游击队进一步加强对绿林武装的争取、教育和改造工作，并曾参与游击队的行动。如1935年5月7日，黔北游击队联络魏银清等股绿林武装，袭击桐梓县花秋区公（驻风水）。同年6月，黔北游击队联络曹明德、何超、江万镒等绿林武装，先袭击桐梓县箭头乡水寮黔军原团长王承绪家；之后，又埋伏于新站与捷阵溪之间的大湾子公路两侧山坡上，袭击从重庆开往贵阳的运军火的3辆汽车，等等。当然，黔北游击队也惩治过阳奉阴违、恶性不改、妄图勾结敌人消灭游击队的绿林武装头目辜海云（桐梓县九坝原团防队长，绰号辜老单）^②。黔北游击队与绿林武装有过如此一段渊源。

1935年夏秋间，一方面，中央红军主力早已离开黔北西进、北上，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也远离黔北，红军遵湄绥游击队已早于同年4月底解体，因此，此时在黔北地域既没有主力红军的活动，也没有成建制的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另一方面，随追剿中央红军而乘虚入黔的蒋介石嫡系势力，取王家烈而代之，已在贵州站稳脚跟，并逐步形成党、政、军、警、特一整套反动统治体系，对贵州尤其是黔北人民实行反革命报复。因此，当时的形势呼唤有人站出来组织领导人民群众与反动派作斗争。（其时，在黔北。赤水地下党已被破坏尚未恢复；遵义第一届县委因林青被捕、牺牲而不复存在，第二届县委尚未建立；其余各县均未建立党组织。）

2、“黔北救国义勇军”组建的梗概

在上述背景下，原寄养于桑木一群众家中的原红军赤水河游击队队长罗彬，伤愈后，即投入了搜寻红军伤病员，组织和改造地方绿林武装为我所用的工作。他们提出“打富济贫”、“抗日救国”的口号，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支持和参与。经过一段时间联络、宣传和组织工作，1935年9月中旬，罗彬与桐梓县的詹纪高、唐克明、魏银清，四川的江万镒、江受镒、吴保康、吴保延，正安、绥阳的罗荣华、葛少轩、陶少奎、陈焱清等绿林武装头目，聚集在正安县庙塘李钻台（现石窖村）开会。罗彬等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倡议成立“黔北救国义勇军”，以“抗日救国”、“打富济贫”为口号，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于是正式成立了“黔北救国义勇军”。会议推举人枪最多的詹纪高任总指挥，罗彬任前敌总指挥，唐克明任副总指挥兼第一路指挥，江万镒、吴保康、罗礼珍、徐久根分别任第二路、第三路、第四路、第五路指挥^③，张麻子任参谋长^④。还制定有“纲领”^⑤。（各级“指挥”有时也称“司令”）

对于“黔北救国义勇军”及其主要领导人，在《“黔北救国义勇军”活动情形档案选载》（以下简称《选载》）的38份电文中频频出现，可资佐证。现举数例：

1936年2月7日，遵义专员甘芳致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吴忠信的急电中称：“……正安县县长飞报，詹纪高等匪部近受共匪委令为伪总指挥，前红军指挥罗明山为前敌伪指挥，率部一千五百余人于江日[3日]围攻县城。……”^⑥

1936年2月2日，正安县邮局长石莹关于县城失陷的呈报中称：“……至匪部名义，‘黔北救国义勇军总指挥詹纪高’，‘第一路指挥唐克明’，尚有江万镒、吴保康、罗荣华、陶某等数头日均称司令官。……”^⑦

1936年3月20日，奉命围剿义勇军的国民党军新八师师长蒋在珍致吴忠信电中称：“……是役俘匪十二名。内有着军服之外省口音五名，夺获粤造枪四支，军委会造枪一支，土枪三支，手榴弹六粒。……”^⑧电文中称“内有着军服之外省口音五人”者，似是失散后又组织起来的红军战士，可见参与教育改造绿林武装的红军，不仅仅是罗彬一人，而应是多人。

二、“黔北救国义勇军”的斗争

根据《选载》电文和1998年正安、道真两县人民政府的报告，可知“黔北救国义勇军”开展斗争的梗概，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发展壮大鼎盛时期。

自1935年9月义勇军成立至1936年2月下旬义勇军撤离正安县城前，约半年时间，是义勇军发展壮大的鼎盛时期。期间，义勇军的活动范围、遍及今天正安县和道真县的28个乡镇，即正安县的庙塘、小雅、桴焉、瑞溪、安场、凤仪、碧丰、杨兴、新州、和溪、乐俭、土坪、格林、俭平等14个乡镇；道真县的玉溪、上坝、三江、隆兴、棕坪、旧城、桃源、忠信、洛龙、河口、阳溪、三桥、大礅、平模等14个乡镇。另据《选载》记载，活动范围曾一度扩展到正安县（含今道真）周边的桐梓、习水、绥阳、务川、后坪及遵义等县部分地区，如九坝、官店、宽阔、枫坝等。据不完全统计，义勇军经历了庙塘、小雅、新州、安场、大礅、土溪、旧城、洛龙等大小几十次战斗。共打击地主、恶霸、土豪、劣绅200余户，其中处决罪大恶极者8人。收缴大洋5万多元，收缴大批枪弹、大米、食盐、鸦片、黄丝、桐油等物资，除补给义勇军军需外，还分发一部分给当地穷苦人民。两县人民不仅从各方面支持义勇军，而且还有近200人参加义勇军，其中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一阶段战斗最激烈、震动最大的是围攻正安县城和保卫正安县城一役。

围攻县城：1936年农历正月初八日（公历1月31日），“黔北救国义勇军”主要领导人詹纪高、罗彬、唐克明，命令各路义勇军分别齐集正安，攻打正安县城。正安县城比较坚固，且守军早有准备，易守难攻。义勇军在城郊，首先击溃了奉命前来增援正安县城的安场冯惠孚、新州戴启厚、乐俭赵继渊等民团，于2月3日对正安县城形成包围之势。

攻打县城及县城被攻破后的情形，正安县邮局长石莹的呈报可作佐证：“……一、县城失陷情形：查本县自二月三日被匪围城后，县长李培根即于次日受伤，所有城中团练由科长李清伦指挥调度，昼夜防守，并派人四出乞援。